

邺城佛教史迹与佛学传承

何 利 群[※]

邺城遗址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地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四省交界处，自古以来为华北平原富庶的农耕经济区和南北交通要道。公元三~六世纪间先后成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六朝国都。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历经三百余年的发展，终由最初的星火传承渐成燎原之势。十六国后赵时期，西域高僧佛图澄在河北一带弘扬佛法，并得到后赵皇室的极度尊崇，由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佛寺塔庙在各地纷纷兴建起来。北魏定鼎河洛，皇室屡在邺城剃度僧尼，建寺立塔。及至东魏迁都邺城，洛阳僧尼随之东迁，北齐初年，邺下佛学达到全盛，中印名僧汇集邺都译经注疏、讲经说法，各种佛学思想在此融汇贯通，邺城成为继洛阳之后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

公元577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将灭佛运动推广到齐境，邺下佛教自此受到沉重打击，寺塔尽毁，僧徒流徙。隋初文帝复兴佛法，名僧大德应诏而出，各地佛法再度繁盛，北朝时期流行于邺下的佛学思想汇入隋唐佛教主流之中，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一、邺城周边现存的石窟及刻经

作为六世纪中叶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邺城周边保存了大量佛教遗迹，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邯郸市峰峰矿区南、北响堂山石窟、水浴寺石窟、涉县娲皇宫石窟、安阳灵泉寺大住圣窟、大留圣窟、小南海石窟及林虑山洪谷寺石窟等。邺城成为继大同云冈、洛阳龙门之后北方地区佛教石窟寺最集中的地点(图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石窟寺往往和当时的高僧行止及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密切关联，因而倍受学术界关注。如安阳大留圣窟是道凭禅修石堂，大住圣窟是灵裕所建金刚性力那罗延窟，小南海石窟为僧稠纪念窟¹⁾，洪谷寺为北齐文宣帝为僧达所建²⁾，而邯郸响堂山石窟的开凿更与北齐皇室重臣有着直接的联系³⁾。此外，邻近的鹤壁五岩山、卫辉香泉寺等亦属邺城京畿的佛教遗迹。邺城周边石窟除保存大量精美的石刻造像之外，还以窟内外崖壁上雕刻内容丰富的佛教石经而闻名于世。石经的内容涉及当时在中原北方地区最为流行的一些佛学思想，如地论、华严、法华、般若、净土、涅槃、禅、律及三阶教等，为探讨北朝晚期盛行的末法思想和流行的佛学流派，以及追溯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极高的学术价值(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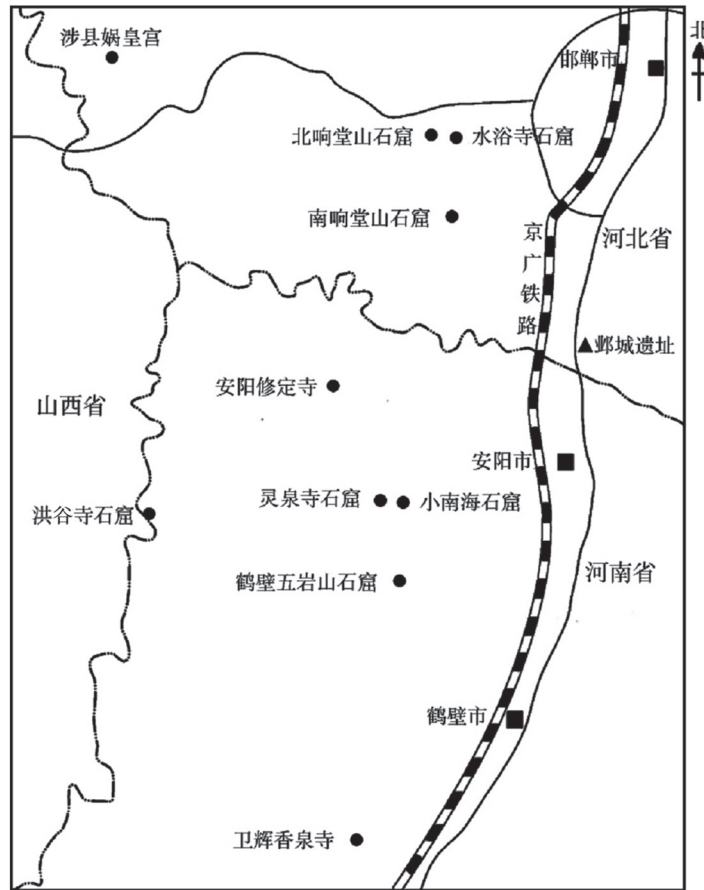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安阳灵泉寺石窟及小南海石窟》，《文物》1988年第4期。

2) 王振国：《关于河南省林州市洪谷寺千佛洞的造像与刻经》，

《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

3) 邯郸市峰峰矿区文管所、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南响堂石窟新发现窟檐遗迹及龛像》，《文物》1992年第5期。



图一 邺城周边佛教遗迹示意图

北朝晚期邺城刻经与佛学流派				
佛教学派	经名	译者	遗迹	代表高僧
地论	十地经论	菩提流支	娲皇宫	慧光、僧范、道凭、法上
华严	大方广佛华严经	佛驮跋陀罗	南响堂山、香泉寺、大住圣窟、小南海	僧范、慧顺、昙衍、昙遵、昙迁、灵裕、慧远、智润
涅槃	大般涅槃经	昙无讫	南响堂山、北响堂山、大住圣窟、小南海	道凭、法上、靖嵩、灵裕、道慎
	摩诃摩耶经	昙景	大住圣窟	
	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	鸠摩罗什	娲皇宫	

法华	妙法莲花经	鸠摩罗什	南响堂山、娲皇宫、大住圣窟	僧范、法上、灵裕、慧远、慧文、慧思
	无量义经	昙摩伽陀耶舍	北响堂山	
	胜鬘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	求那跋陀罗	北响堂山、大住圣窟	
净土	无量寿经优波提舍愿生偈	菩提流支	北响堂山	法上、灵裕、慧远、昙衍、真玉
	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	鸠摩罗什	北响堂山	
般若	维摩诘所说经	鸠摩罗什	北响堂山	慧光、僧范、慧顺、道凭、慧远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鸠摩罗什	北响堂山、南响堂山	
	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曼陀罗仙	南响堂山	
三阶教	大集月藏经	那连提离耶舍	大住圣窟	信行、僧邕
	佛说佛名经	菩提流支	北响堂山、大住圣窟	
	现在贤劫千佛名经	佚名	北响堂山	
	七阶礼忏文	信行	大住圣窟	
	佛说决定毗尼经	敦煌三藏	大住圣窟	
	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	曷良耶舍	大住圣窟	
法相	深密解脱经	菩提流支	娲皇宫	

表一 北朝晚期邺城刻经与佛学流派⁴⁾

二、邺城佛教寺院与造像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 与佛教寺院相关的考古发现

1998年及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建的邺城考古队在邺北城南城墙下发现一处地下潜伏城门⁵⁾。发掘过程中先后出土两块文字瓦当残块。拼合后的瓦当残存大半，直径16-16.1、边郭宽1.5-1.7、厚2.0厘米。当心圆钮饰六瓣叶纹，当面对成组的棱线分为四区，每区内填写二字，由左至右竖读“大赵□□/光[在]浮图”（图二），文字外两周凸弦纹，外缘饰一圈三角形锯齿纹。该瓦当与邺城地区出土的“大赵万岁”文字瓦当在形制、制法、纹饰和字体上基本一致，残缺文字部分应为“万岁”两字⁶⁾。此为邺下十六国后赵时期与佛教寺院密切相关的实物资料，是以佛图澄为代表的高僧信众在邺下传授佛法、建塔立寺的重要证据。

2002年~2012年，邺城考古队在邺南城朱明门外赵彭城村西南发掘了一处东魏北齐时期的皇家寺院。2002年发掘的寺院塔基出土了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心刹柱和砖函，填补了汉唐考古学、古代建筑

4) 该表参考李裕群《邺城地区石窟与刻经》（《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增补部分内容后修定。



图二 “大赵□□ / 光作浮图”



图三 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发掘现场

史和佛教史上的多项空白（图三）⁷⁾。在随后的近十年时间里，邺城队先后勘探发掘了寺院外部围壕；西南院落四周廊房及向北延伸的回廊式建筑；寺院围壕的东、南通道；寺院东南院落北部大殿、连廊、廊房及寺院北部大型殿堂的局部。邺南城赵彭城北朝佛寺是近年来佛教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其布局与北魏时期前塔后殿式的寺院布局有所不同，显著特征是土木结构的方形木塔仍然占据寺院的中心位置，但在塔后相应位置迄今尚未勘探出佛殿遗迹，而在南北中轴线最北端发掘出一座大型殿堂，为探讨北朝晚期寺院讲堂的配置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图四）⁸⁾。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寺院东南隅和西南隅各有一座由廊房封闭的大型院落，院落中部偏北处建有大型佛殿，反映了由北魏时期流行的以塔为中心的前塔后殿单院式布局，向隋唐以后普遍出现的以佛殿为中心的多院多殿式布局的转变，在中古寺院建筑格局的演变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⁹⁾。

自2012年起，结合邺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创新课题，邺城考古队开始对位于河北省临漳县习文乡核桃园建筑基址群进行系统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并于2012至2014年度对基址群南部的1号和5号建筑基址进行了全面的揭露。

核桃园1号建筑基址地处东魏北齐邺城中轴线——朱明门外大道东侧，北距邺城南城墙约1200米，西距赵彭城佛寺塔基约830米。经发掘确认该基址是北齐时期兴建的一座大型土木结构方形木塔遗迹，出土遗物以灰砖、板瓦、筒瓦和瓦当等建筑材料为主（图五）。在距地面约2米左右的基槽夯土层与卵石层交界面上发现一件石函，上刻“三宝口口”字迹（图六）。石函及四角的青瓷罐内清理出大量“常平五铢”及各种质地的管、珠、坠饰、圆形和椭圆形石饰、铜印、铜饰件及琉璃器残片，其中保存较好的一件长颈琉璃瓶中还残存有水银（图七）。核桃园5号建筑位于1号塔基北面约40米处，根据遗迹现象、地层叠压关系及包含物，可以确认5号基址由早、晚两期建筑遗迹构成，晚期基址与1号塔基同属北齐时期修建的寺院建筑遗存，可能是塔基北部的一处门址。出土的砖瓦建筑构件规制较为统一，戳记文字瓦件数量较多，并发现表面施釉的琉璃瓦¹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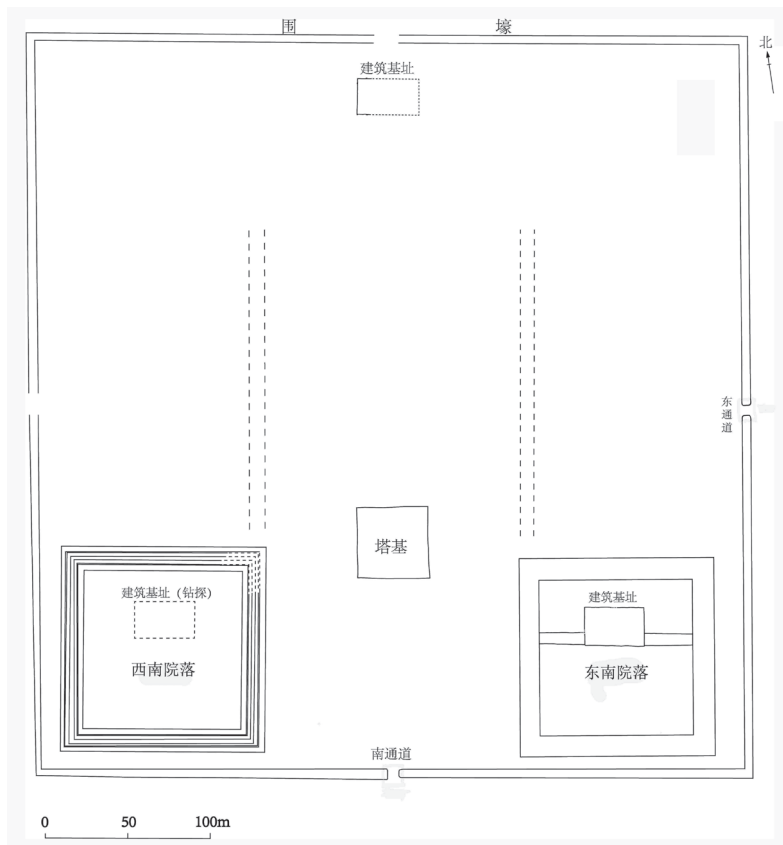
核桃园1号和5号建筑基址发现与发掘对于了解北朝晚期建筑技术、佛教瘞埋制度以及探讨核桃园建筑基址群和邺城南郊宗教礼制建筑群的分布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历年出土造像及北吴庄佛像埋藏坑的发掘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邺城遗址（包括邺北城、邺南城及推测的外郭城）范围内陆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北朝造像，地点涉及河北临漳县邺镇、井龙、洪山、东太平、上柳、马辛庄、河图、板屯、栗辛庄、义城、张彭城、西灵芝、赵彭城、北吴庄等十余处村庄。此外磁县南白道村及成安城关镇南街出土的佛像亦属邺城京畿范围内的埋藏。历年所见者不乏经典之作，并有数次是具有埋藏坑性质的较大规模出土，以下简述几次较重要的发现：

1958年，临漳县习文乡上柳村修建太平渠时出土5件石刻造像，其中编号1116的透雕白石一铺七身像通高73厘米，保存完好，是北齐中后期“龙树背龕”式造像的典型代表（图八）¹¹⁾。1980年和1987年还在该村先后发现了两件大型造像的底座。

-
- | | |
|------------------------------------------------------------------------------|--------------------------------------------------------------------------------------------|
| 5) 邺城考古工作队：《邺北城发现城墙下潜伏城门及附属设施》，《中国文物报》2002年1月11日第1版。资料现存邺城考古队。 | 9) 何利群：《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寺院的考古学研究——以塔、殿、院关系的演变为中心》，《石窟寺研究》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10年。 |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临漳县文物旅游局：《邺城文物菁华》，第58-59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核桃园北朝1号与5号建筑的发现与发掘》，《2015年中国考古重要发现》，文物出版社，2016年。 |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0年第7期。 | 11) 郑绍宗：《河北临漳出土石刻造像记》，《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庆祝会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3年。 |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2010-2011年的发掘》，《考古》2013年第12期。 | |



图四 赵彭城北朝佛寺平面图



图五 核桃园佛寺 1 号塔基



图六 核桃园 1 号塔基中心出土石函及卵石遗迹



图七 核桃园 1 号塔基石函内出土部分遗物

1958年，习文乡河图棉站附近修建太平渠时出土东魏北齐造像十余件，虽然大多残破，但部分造像的做工相当精致。

1979年，习文乡栗辛庄村东出土一佛二菩萨背屏式造像，白石质，通高93厘米，保存完整，亦为东魏北齐造像精品之一（图九）¹²⁾。

1985年，习文乡上柳村西南漳河堤出土北魏正光元年至武泰元年铜造像8件，主尊多为观世音菩萨¹³⁾。

1997年，邺城考古队在习文乡板屯村发掘出一处埋藏有大量佛像碎块的灰坑，出土残块100余件（块），均为白石质，形体较小，多为背屏式造像残块，有36件可辨识其形像或所在部位，另有82件碎块不辨其形。表面残见彩绘，部分有贴金痕¹⁴⁾。

1997年，成安县城关镇南街寺院遗址出土一批北魏至唐代造像，以东魏北齐背屏式白石造像为主，另有少量北魏的青石像及唐代红砂岩造像，总数量当在数百件以上，是邺城京畿地区佛教造像的一次重大发现（图十）¹⁵⁾。

2012年1月10日至25日，邺城考古队在邺城遗址东郊的北吴庄北地漳河河滩内，抢救性发掘出一处佛教造像埋藏坑。该埋藏坑地处东魏北齐邺南城东城墙东约3公里处，属推测的邺南城外郭城区，后代改道的漳河流经这一区域，因而在其上形成4-5米厚的流沙层（图十一）。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器物特征，该埋藏坑的时代不早于唐代¹⁶⁾。

埋藏坑内出土造像数量众多，经测量编号的共计2895件（块），另有3000左右造像碎片和少量砖、瓦、瓷片。造像堆放密集，其间未见有明显的分层和间隔，总体呈无序状态（图十二）。质地以白石为主，少数为青石，个别为陶质及其它石质，表面多残存有彩绘和贴金痕。时代从北魏至唐代，以东魏北齐时期造像占绝对多数。“经新近统计，造像底座约900件，题记造像300件左右，”题材涉及释迦、弥勒（交足、倚坐）、阿弥陀（无量寿）、药师、卢舍那、释迦多宝、思惟太子、观世音、双菩萨和双思惟像等。早期造像组合以佛三尊像为主，北齐中后期出现较多的以佛或菩萨为主尊的五身像和七身像组合。

结合历年出土造像，邺城地区北朝时期背屏式造像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目前邺城地区出土较早的是北魏中后期造像，时代约当于公元5世纪末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494年）前后，均为青石质，特征与之前的云冈石窟造像样式一致（图十三）。北魏后期至东魏前期造像数量逐渐增多，质料以青石常见，东魏开始出现较多白石像。其时代约当公元6世纪初至6世纪中叶之前，即北魏孝明帝景明初年至东魏孝静帝元象、兴和年间，造像特征与6世纪初龙门石窟造像相近，反映的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全面实行汉化政策后，摹仿南朝造像而出现的新样式（图十四）¹⁷⁾。东魏后期至北齐前期造像数量大增，以白石为主。时代相当于6世纪中叶，即东魏孝静帝武定初年至北齐文宣帝天保年间。造像样式主体延续前一阶段的风格，但在细部发生了变化（图十五）。北齐中后期造像数量最多，绝大多数为白石。造像型式与前段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常以透雕双树为背屏，北齐新样式佛像为主尊，衬托以龙塔瓔珞装饰。此类“龙树背龕式”造像在天保末年以后广泛流行，是邺城地区北齐中后期佛教造像的典型样式（图一六）¹⁸⁾。

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地层关系明确，出土佛像数量众多，造像工艺精湛，造型精美，题材丰富，

12) 河北临漳县文物保管所：《河北邺南城附近出土北朝石造像》，《文物》1980年第9期。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邺城遗址出土的北朝铜佛像》，《考古》1992年第8期。

14) 资料现存邺城考古队。

15) 邯郸市文物研究所：《邯郸古代雕塑精粹》，文物出版社，2007年；钟维：《邯郸北朝时期单体佛教造像的发现与探索》，《追溯与探索—纪念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成立四十五

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北京，2007年。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与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考古》2013年第7期。

17) 杨泓：《试论南北朝前期佛像服饰的主要变化》，《考古》1963年第6期。

18) 何利群：《从北吴庄佛像埋藏坑论邺城造像的发展阶段及“邺城模式”》，《考古》2014年第5期。



图八 北齐佛七尊像



图九 东魏北齐佛三尊像



图十 北齐菩萨像



图十一 北吴庄佛像埋藏坑发掘现场



图十二 北吴庄佛像埋藏坑佛像堆积状况



图十三 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刘伯阳造释迦像



图十四 北魏正（始）二年（505年）三鍾、法荣造像



图十五 东魏武定五年（547年）僧略造释迦像



图十六 北齐佛七尊像

时代跨越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和唐代，各时期纪年明确，时代特征明显，为研究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类型和题材提供了可靠的标本，充分显示了邺城作为中原北方地区北朝晚期佛教文化艺术中心的历史地位。

三、邺下盛行之佛学流派及其谱系传承

根据文献记载，邺下佛教初兴于十六国时期。值此中原北方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之际，西域高僧佛图澄来到河北，以其德行及神异之术为后赵石勒信服礼敬，尊称为大和尚，凡事必谘而后行。佛图澄借此劝诫石勒悯念苍生、多行仁政，中原士民受益良多，官宦士族及各族百姓由是奉佛者日众。佛图澄在邺弘法期间，威望日重，声名远播。海内外名僧前来求学受教者络绎不绝，邺下佛学渐成体系，僧团规模初具雏形，佛法之盛，前所未有的。澄公门下，弟子众多，既有竺佛调、须菩提等数十天竺、康居名僧，不远万里，追随闻法，亦不乏大量中土名士跨关渡河，前来受教¹⁹⁾。知名者如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进、道安、法雅、法汰、法和、僧朗、安令首尼等。法雅创立格义，法汰弘教江南，法和授徒蜀中及西北，而尤以释道安最为南北人望，其博学多识，德行卓越，著述丰厚，集汉代以来般若、禅法、毗昙诸学于一身，又兼创立僧团仪式、行规戒律、礼忏仪轨等，堪称中国早期佛教发展传播过程中划时代的关键人物²⁰⁾。公元365年，为避前燕虏掠，道安率众四百余人南迁。在长年的流徙途中，道安深悟乱世凶年，佛教不依附世俗皇权则难以自立，痛感聚则不立，散无不可，且佛法之教化，亦赖于僧众之广布，于是在新野和襄阳两次向各地分派徒众，其同门及弟子先后前往江东、荆襄、川蜀及关中诸地弘法²¹⁾。此次道安率众南迁并分张徒众事件在佛教史上意义非同寻常，邺城的僧众由是广布大江南北，邺下佛学始得传承并宏扬光大。

北魏统一中原北方后，皇室也曾多次在邺剃度僧尼，兴建寺院。唐法琳《辩正论》载：“魏太宗明元皇帝（讳嗣），……愍念四生，敬重三宝。仍于邺下，大度僧尼。……魏世祖太武皇帝（讳焘），……回向一乘，皈依三宝。复伽蓝之胜地，创招提之净宫。仍于邺城，造宗正寺。……魏高祖孝文皇帝（讳宏），……仍于邺都，造安养寺。硕德高僧，四方云集。……魏肃宗孝明皇帝（讳诩），……总三乘以驰骋，临四衢而闲步。仍于邺下，造大觉寺。窈窕曲房，参差复殿。”²²⁾

由此可知，历代北魏皇室不仅在邺下大度僧尼，并先后建造宗正寺、安养寺和大觉寺等佛教寺院，而北魏孝文帝更曾在邺城修建宫殿，并一度考虑迁都于此²³⁾，因而邺城在北魏一朝依然为河北佛法重镇。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东魏权臣高欢挟持孝静帝迁都邺城，“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狼狽就道”²⁴⁾。此次东迁人口众多，除官僚世族和士卒百姓外，洛阳城内大量的僧尼也在随迁之列，《洛阳伽蓝记》载“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²⁵⁾北魏末年活跃于洛阳译场的天竺僧人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昙般若流支等随之东迁，而游学于洛阳的中土名僧如慧光、僧稠、僧范、道凭、法上等也先后应诏赴邺，邺下佛教由此大盛。诚如文献所载，“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故宇内英杰，咸归厥邦。”²⁶⁾

19) [梁]慧皎：《高僧传》卷九《竺佛图澄一》，《大正藏》卷50，第383页，大正一切经刊行会（东京），1924~1932年。

20)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35-136页，161-1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1) [梁]慧皎：《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一》，《大正藏》卷50，第352页。

22) [唐]法琳：《辩正论》卷三《十代奉佛上篇第三》，《大正藏》卷52，第506-507页。

23) [北齐]魏收：《魏书·高祖纪下》，第173页，中华书局，1974年。

24) [唐]李百药：《北齐书·神武纪下》，第18页，中华书局，1972年。

25) [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序，《大正藏》卷51，第999页。

26)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隋彭城崇圣道场释靖高传一》，《大正藏》卷50，第501页。

邺下佛教全盛之时，硕德云聚，义学星罗。小乘之毗昙、成实，大乘之地论、华严、维摩、法华、净土、涅槃以及禅、律等佛学思想在此融汇。北朝末年，各种宗派初露端倪，门户之见尚未见深，一些高僧往往精通数论，大小乘兼习者也屡见不鲜。东魏国僧统慧光既为地论南道宗师，又是律学大师，同时“华严涅槃维摩十地地持等，并疏其奥旨而弘演导”²⁷⁾，其弟子北齐昭玄大统法上“乃讲十地地持楞佑（伽）涅槃等部，轮次相续，并著文疏”²⁸⁾，僧范“讲华严十地地持维摩胜鬘，各有疏记，复变疏引经制成为论”²⁹⁾，僧达“讲华严四分十地地持”³⁰⁾，慧顺“初听涅槃，……讲十地地持华严维摩，并立疏记”³¹⁾，道凭初习维摩涅槃，后行禅境，“讲地论涅槃花严四分”³²⁾，道凭弟子灵裕“专业华严涅槃地论律部……又从安、游、荣等三师听杂心义，嵩、林二师学成实论”，著述颇丰³³⁾，法上弟子慧远“大小经论普皆博涉”，并习禅律法华维摩，“七夏在邺创讲十地，一举荣问众倾余席，自是长在讲肆，伏听千余。”³⁴⁾通过了解这些高僧的诵习修养、谱系事迹可以明确东魏北齐时期邺城地区的佛教流派以及传承。

地论与华严学 邺下宗派最盛者当属地论学派，该派以诵习宣扬《十地经论》著称。按《十地经论》本为世亲菩萨所著，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年）由菩提流支在洛阳译出，勒那摩提和佛陀扇多及义学缙儒一千余人参与译事。地论之学初兴于洛阳，后盛于邺下。由于菩提流支与勒那摩提关于佛性“始有”和“本有”的观点有异，故使所传门下南北两道，其意义极为深远。正如《续高僧传》所载“初勒那三藏教示三人，房定二士授其心法，慧光一人偏教法律。菩提三藏惟教于宠，宠在道北教军宜四人，光在道南教凭范十人。故使洛下有南北二途，当现两说自斯始也，四宗五宗亦仍此起。”³⁵⁾地论北道为道宠开创，宠出身儒门，后随菩提流支学十地三年，随闻出疏，既而开学，声唱高广，邺下荣推，从学者千余人，知名者有僧休、法继、诞礼、罕宜、儒果等。而南道则以慧光为元匠，光年幼出家，时号“圣沙弥”，博学多才，禅律诸学均大有建树，后从勒那摩提受学。东魏迁邺后慧光出任国僧统，地论之流传以其贡献最大，门下高徒号称“十哲”，道凭、僧范、法上、僧达、慧顺及再传弟子灵裕、慧远、昙迁等并以地论见长，或广为传讲，或立疏记流传于世，同期的梁陈佛学及后世隋唐法相等宗派均或多或少的受到地论学说的影响。河北涉县娲皇宫南、北窟及窟外崖面大幅北齐《十地经论》刻经，当是地论之学盛行的力证³⁶⁾（图十七）。

地论学的流传直接导致北方华严学的盛行，由于《十地经论》为《华严经》第六会《十地品》的释论，因而上述地论大师均研习华严。僧范、慧顺、昙衍、昙遵及昙迁、灵裕、慧远各有疏记多卷，不少僧人于齐隋之际或南下江东，或西入长安，邺下华严思想传播甚广。其中以慧光门下昙遵、昙迁、智润一系更与华严祖师智正、智俨有极深的渊源关系，故被视为华严宗师承之缘起³⁷⁾。华严系统的刻经在邺城周边石窟刻经中保留有四处遗迹，规模最大的是南响堂1窟，右壁和前壁共刻有《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光明觉品》、《明难品》、《净行品》及《四谛品》的部分经文（图十八），另外，在河南卫辉香泉寺、安阳灵泉寺及大住圣窟、小南海中窟等处也发现有长短不一的华严经节文、偈赞或经碑³⁸⁾。

律学 邺下律学甚为兴盛，大乘菩萨戒以《地持经》为主，自慧光以下，僧范、法上、慧顺、灵裕等均擅讲此经，并各有疏记，灵裕弟子昙荣更以地持为长，“专业律宗经余六载……，偏行大业，故以

27)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一《齐邺下大觉寺释慧光传三》，《大正藏》卷50，第607页。

28)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齐大统合水寺释法上传六》，《大正藏》卷50，第485页。

29)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齐邺东大觉寺释僧范传一》，《大正藏》卷50，第483页。

30)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六《齐林虑山洪谷寺释僧达传七》，《大正藏》卷50，第553页。

31)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齐邺下总持寺释慧顺传三》，《大正藏》卷50，第484页。

32)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齐邺西宝山寺释道凭传四》，《大正藏》卷50，第484页。

33)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九《隋相州演空寺释灵裕传八》，

《大正藏》卷50，第49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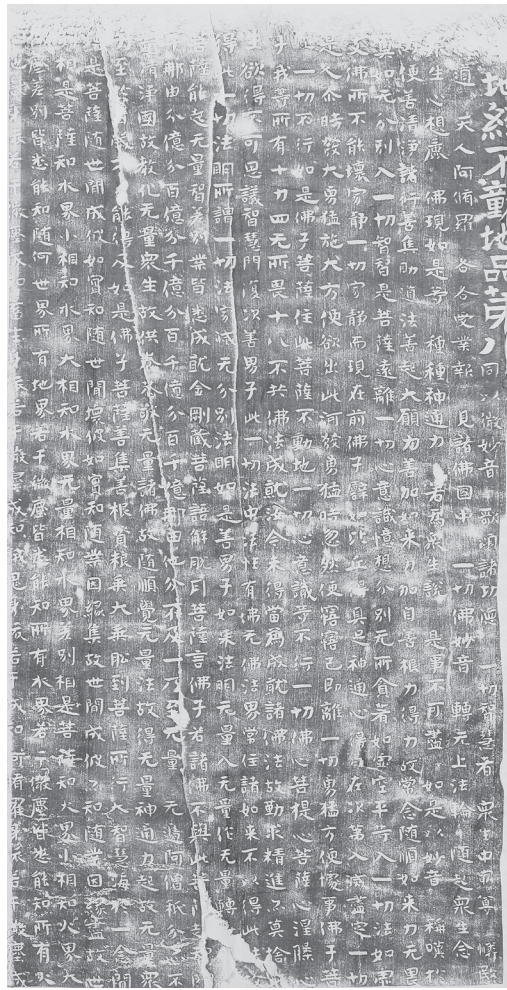
34)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隋京师净影寺释慧远传十四》，《大正藏》卷50，第490页。

35)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七《魏邺下沙门释道宠传九》，《大正藏》卷50，第482页。

36) 马忠理、张沅、程跃峰、江汉卿：《涉县中皇山北齐佛教摩崖刻经调查》，《文物》1995年第5期。

37)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165页，中华书局，1982年。

38) 李裕群：《邺城地区石窟与刻经》，《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灵泉寺北齐娄睿华严经碑研究》，《考古学报》2012年第1期。



图十七 涉县娲皇宫十地经论



图十八 南响堂山1号窟华严经

地持为学先”³⁹⁾。而邺下律学最盛者当为四分律，按四分一部，所创虽早但惟据口传，于世无闻。及慧光出道，师从佛陀扇多、勒那摩提等，“博听律部，随闻奉行……，四分一部，草创基兹。”⁴⁰⁾撰《四分律疏》、《大乘义律章》、《仁王七诫》、《僧制十八条》等，并删定《羯磨》戒本，后世僧众咸披诵之。慧光系统昙隐、僧达、道凭、灵裕、法愿等均以四分律部见长，襄阳僧智闰也曾北上从慧光听十地四分。光师门下亦不乏专攻律部者，昙隐先后师从道覆、慧光学律，博采精要，驰名河北，故“邺中语曰：律宗明略，唯有隐乐。”⁴¹⁾此外，“学士道云，早依师稟。奉光遗令专弘律部，造疏九卷为众所先。……又光门人道晖者，连衡云席。情智傲岸不守方隅，略云所制以为七卷。”⁴²⁾后世律之三宗——南山道宣、相部法砺及东塔怀素均出自慧光、道云一系，故慧光又被尊为律宗之祖。

禅及楞伽学 北朝禅学传统深厚，邺下禅僧为数甚众，《续高僧传》称道恒于东魏天平初年在邺授禅，徒侣千计。当时影响最大的是僧稠，稠曾师从道房、道明禅师，后入少林寺拜诣祖师跋陀，呈己所证，跋陀盛赞其“自葱岭已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乃更授机要。后应诏入邺，文宣帝高洋奉为国师，为之建寺，从受菩萨戒，“并敕国内诸州，别置禅肆。”⁴³⁾高洋晚年更是笃信禅法，天保十年(559)远赴辽阳甘露寺，并于“甘露寺禅居深观，唯军国大政奏闻。”⁴⁴⁾现存安阳灵泉寺大留圣窟(道凭石堂)及小南海石窟(僧稠禅师纪念窟)均可能与禅修有关，而在《续高僧传》中也有不少关于石窟坐禅的记载⁴⁵⁾。

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在邺下的活动未见详载⁴⁶⁾，但其弟子二祖慧可(又名僧可)秉承师学，受四卷《楞伽经》，于东魏“天平之初，北就新邺盛开秘苑”⁴⁷⁾。达摩一派以楞伽为法要，世称为楞伽师，法上、昙迁等亦擅楞伽之学。南朝慧布曾北上邺城从学慧可习禅，后返栖霞，在保恭盛邀下讲授禅法，在南方影响至深，史称“摄山慧布，北邺初还欲开禅府，苦相邀请建立清徒，(保)恭揖慧布声，便之此任，树立纲位引接禅宗，故得栖霞一寺道风不坠，至今称之，咏歌不绝。”⁴⁸⁾达摩之学性属大乘空宗，与当时流行禅法有颇多不同之处，一度罹受讥讽排挤，后经慧可弘扬，再传僧璨、道信、弘忍直至神秀、慧能，最终奠定了禅宗的谱系传承。

毗昙与成实学 南北朝晚期，小乘之毗昙与成实学也比较流行，北方地区尤以毗昙学为盛，时有“江南盛弘成实，河北偏尚毗昙”之议⁴⁹⁾。灵询曾“学成实论并涅槃经，穷其幽府”⁵⁰⁾。靖嵩学遍名师，“唯有小乘未遑详阅，遂从道猷、法诞二大论主，面受成杂两宗”，后撰《杂心疏》五卷⁵¹⁾。道纪“未详氏族，高齐之初，盛弘讲说，然以成实见知”⁵²⁾。灵裕精研地论、华严诸学外，又多方从师学《杂毗昙心》和《成实论》⁵³⁾。东魏时在邺都金华寺译经的北天竺僧人毗目智仙“特善毗昙”。高齐之世，慧统统解小乘，世称“毗昙孔子”，初在邺洛一带弘道为宗，后与大统法上不和而徙于徐州为僧统，“仍居彭沛大

39)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唐潞州法住寺释县荣传三》，《大正藏》卷50，第589页。

40)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一《齐邺下大觉寺释慧光传三》，《大正藏》卷50，第607页。

41)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一《齐邺东大衍寺释昙隐传四》，《大正藏》卷50，第608页。

42)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一《齐邺下大觉寺释慧光传三》，《大正藏》卷50，第608页。

43)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六《齐邺西龙山云门寺释僧稠传八》，《大正藏》卷50，第553页。

44) [唐]李百药：《北齐书·文宣纪》，第66页，中华书局，1972年。

45) 丁明夷：《北朝佛教史的重要补正——析安阳三处石窟的造像题材》，《文物》1988年第4期。

46) [唐]道宣：《续高僧传》及《洛阳伽蓝记》等较早期的文献均未记载菩提达摩在邺城的经历，但《续高僧传》卷十六标题将其列为齐邺下南天竺僧。按达摩卒于天平年间(534-

537年)，正值东魏迁邺之初，或为东迁不久即已坐化，故其邺下事迹不显。

47)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六《齐邺中释僧可传六》，《大正藏》卷50，第552页。

48)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一《唐京师大庄严寺释保恭传十》，《大正藏》卷50，第512页。

49) [唐]湛然：《法华玄义释签》，《大正藏》卷33，第951页。

50)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齐并州僧统释灵询传五》，《大正藏》卷50，第484页。

51)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隋彭城崇圣道场释靖嵩传一》，《大正藏》卷50，第501页。

52)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三十《高齐邺下沙门释道纪传二》，《大正藏》卷50，第701页。

53)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九《隋相州演空寺释灵裕传八》，《大正藏》卷50，第495页。

阐宏猷，江表河南率遵声教。”⁵⁴⁾其门下弟子志念、慧休于隋唐也颇具声望⁵⁵⁾。

除上述诸学外，涅槃、净土及法华思想在邺城也有较为广泛的弘传，尤以涅槃经最为普及。邺下僧人出道之初常习此经，而道凭、法上、靖嵩、灵裕等高僧均研通涅槃之学，其中不乏专攻此业者。如邺下定国寺道慎年少出家，曾从慧光学习地论，“后禀上统而志涅槃”⁵⁶⁾。邺城周边刻经中涅槃系统的经典所见甚多，如南响堂6窟外上方刻有《大般涅槃经·圣行品》中的“诸行无常偈”，北响堂半山腰刻有《大般涅槃经·狮子吼菩萨品》，小南海中窟外崖面刻有《大般涅槃经·圣行品》(图十九)，大住圣窟内前壁刻有《摩诃摩耶经》卷上，窟外壁面刻有《涅槃经》有关“诸行无常”偈言。另外在娲皇宫北窟北壁及曲阳八会寺南龕内分别刻有《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⁵⁷⁾。邺城周边重要石窟均见此类似刻经，足见涅槃学在当时之普及。

净土信仰以西方净土为主，灵裕、慧远等各有疏记。北响堂南洞窟外左壁现存《无量寿经优波提舍愿生偈》刻经。对弥勒的崇拜也不少见，如义僧昙衍临终前念弥勒佛，法上在邺城西山合水寺的山顶上建造弥勒堂，齐亡法灭后，“(法)上私隐俗服习业如常，愿若终后覲睹慈尊。如有残年愿见隆法，更一顶礼慈氏如来”⁵⁸⁾。北响堂南洞窟外右壁及八会寺北龕内均刻有《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同时也有信奉其他净土者，邺中天平寺真玉“忽闻东方有净莲华佛国庄严世界与彼不殊，乃深惟曰：‘诸佛净土岂限方隅，人并西奔一无东慕，用此执心难成回向。’便愿生莲华佛国。”⁵⁹⁾与净土思想有关的图像学资料在邺城周边石窟中也有较多的发现，如南响堂1窟前壁门道上方的西方净土变，小南海中窟左壁雕有弥勒兜率天说法，右壁有出自《无量寿经》的十六观⁶⁰⁾。

法华之学虽在僧范、法上、慧远、灵裕等邺下高僧事迹中只有简单的记载，但在邺城地区的石窟中却多见《妙法莲花经》和《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广经》的刻经，南响堂2窟两侧壁龕柱上刻有《妙法莲花经·化城喻品》中十六佛名，娲皇宫北窟北侧崖面有《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节文，大住圣窟窟外刻有《妙法莲花经·如来寿量品》，八会寺西龕内也刻有《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同为法华部重要经典的《无量义经》和《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广经》在邺城周边石窟刻经中也常有发现，其中《无量义经·德行品》见于北响堂南洞窟内前壁，而《胜鬘经》则在北响堂南洞窟外右壁及大住圣窟窟外崖面均有见⁶¹⁾。据此可知法华思想当时也应较为流行，天台宗之初祖北齐慧文、二祖南岳慧思也都曾在齐境长期弘法⁶²⁾。

法相之学虽然成形于唐代玄奘法师译出《解深密经》之后，但该经的同本异译《深密解脱经》在北朝晚期已由菩提流支译出，并见于娲皇宫北窟北侧崖面，而作为法相宗重要思想来源的《华严经》、《十地经论》等更是邺下极盛之学派。

北朝时期论述大乘般若性空思想的主要经典是后秦鸠摩罗什所译《维摩诘所说经》，这在邺城佛学流派中也有反映，如上述所引，自慧光以下，僧范、慧顺、道凭、慧远等名僧均对《维摩诘经》进行过专门的研习。北响堂南洞经廊中即刻有长篇的《维摩诘经》，而作为阐述大乘初期般若性空思想的基础典籍《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的十二部经名和相关经文，在北响堂南洞窟上方及南响堂2窟后壁中

54)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七《齐彭城沙门释慧嵩传十》，《大正藏》卷50，第483页。

55) 志念先后师从道长、道寔、慧嵩习智论、地论及毗昙学，其弟子慧休亦曾就学于灵裕，为唐初元匠，再传至玄奘。后玄奘大译说一切有部经典，或许与其师承有关。

56)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齐邺下定国寺道慎传七》，《大正藏》卷50，第486页。

57) 刘建华：《河北曲阳八会寺隋代刻经龕》，《文物》1995年第5期。

58)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齐大统合水寺释法上传六》，《大正藏》卷50，第485页。

59)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六《齐邺中天平寺释真玉传二十》，《大正藏》卷50，第475页。

60) 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第222、227页，文物出版社，北京，2003年。

61) 李裕群：《邺城地区石窟与刻经》，《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马忠理：《邺都近邑北齐佛教刻经初探》，载《北朝摩崖刻经研究》，齐鲁书社，1991年。

62) [陈]慧思：《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大正藏》卷46，第787页；[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七《陈南岳衡山释慧思传二》，《大正藏》卷50，第563页。



图十九 小南海中窟大般涅槃经



图二十 灵泉寺大住圣窟与三阶教思想有关的刻经

也有发现，另在南响堂 2 窟窟门左侧还刻有萧梁时期曼陀罗仙所译《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节文⁶³⁾。

隋唐之际颇具争议的三阶教创始人信行、僧邕早年均在邺下活动，僧邕更是“于邺西云门寺依止僧稠而出家焉”⁶⁴⁾。而作为三阶教重要经典的《大集月藏经》为那连提耶舍于北齐天统二年（公元 566 年）在邺都天平寺所译，并在大住圣窟内外分别刻有《阎浮提品》和《法灭尽品》，这显示出三阶教与邺城佛教之间存在有极深的渊源。此外，与三阶教关系密切，反映忏悔灭罪思想的佛名经系统经文在邺城周边石窟刻经中有大量发现，如在北洞堂南洞窟外廊柱上有出自《佛说佛名经》中的二十五佛名，外侧窟顶崖面有出自《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中的弥勒佛、狮子佛、明炎佛等。安阳大住圣窟窟外崖面则刻有信行禅师所撰的《七阶礼忏文》，出自西晋敦煌三藏《佛说决定毗尼经》中的三十五佛名，出自北魏菩提流支《佛说佛名经》中的二十五佛名，出自刘宋罽良耶舍《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中的五十三佛名（图二十）。曲阳八会寺东壁及南壁龕内外也发现有出自上述经典的七佛、二十五佛、五十三佛及贤劫千佛名号⁶⁵⁾。值得注意的是，石窟刻经题材应该是当时佛学思潮的直接映射，而在文献中与三阶教相关的记载却寥若晨星，这一方面反映了信行等人重实践轻著述的行为，另外或许也与后代正统的佛教宗派长期视三阶教为异端有关。

综上所述，东魏北齐时期的邺城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中占据着特殊的承启地位，是十六国北朝以来，北方地区继长安、洛阳之后的佛教中心和佛学思想汇聚地，是三百多年来北方佛学的缩影和总结。南北朝佛学之异趣诚如汤用彤先生所言：“南方偏尚玄学义理，上承魏晋以来之系统。北方重在宗教行为，下接隋唐以后之宗派。”⁶⁶⁾邺城佛教虽终止于周武灭法杨坚毁城，但其佛学精髓深深植根于隋唐以后的华严、法华、法相、净土、禅、律诸宗及三阶教中，形灭神在，传承有序。

63) 李裕群：《邺城地区石窟与刻经》，《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

64)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九《唐京师大住圣窟寺释僧邕传九》，《大正藏》卷50，第583页。

65) 李裕群：《邺城地区石窟与刻经》，《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

66)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3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Buddhist Historical Sites and Buddhist Inheritance in Ye City

HE Li-qun

Ye City is situat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four Provinces of Hebei, Henan, Shanxi and Shandong. Since the 3rd century AD, This area had been in turn the original hom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the ancient capital of six dynasties. After the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Buddhism continued to develop in the north of Huang River and east of Taihang Mountain. Buddhism of Ye City reached its peak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Eastern Wei & Northern Qi Dynasties, and became the Buddhist center in the northern Central Plain replaced Luoyang City. Recently, several grand scale of Buddhist state monasteries were discovered and excavated in Ye City site, as well as large number of Buddhist stone statues. Merging the textual evidences and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this paper summarize and interpret comprehensively Buddhist historical sites and Buddhist inheritance of Ye C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ixteen Kingdoms and the Northern Dynasty.

Keyword :

Ye City Buddhism The Sixteen Kingdoms The Northern Dynasty